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学史研究专题

## “诸子互补”与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

姚振文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 要:**中国传统兵学一直在诸子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成长。在中国各主要历史时期,诸子思想对兵学发展均有影响,以典型的兵家人物和兵家典籍为个案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兵家思想在这种影响下发展的特点和成就。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兵学之所以能够达到很高的哲学层次和精神境界,能够遥遥领先于世界古代军事文化发展,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与诸子思想的共振、互动中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诸子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诸子互补;兵学;兵家人物;兵家典籍;儒家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cnki.1673-2618.2023.01.005

中国传统兵学是达到了很高的哲学层次和精神境界的学问,其思想精髓和主要精神(“兵学之魂”)大致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其一是义战与仁本观念,它是中国传统兵学的头脑与中枢,即引导人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待战争,以正义或公正汇聚战争的正能量,最终使战争合于历史长河的生命律动,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其二是谋略和智慧,它是中国传统兵学的主体内容。兵法谋略丰富多彩,瑰丽多姿,其中既有“上兵伐谋”的全胜战略观念,也有“兵者诡道”为核心的各种用兵原则,还有众多的胜战技法。然而,沧海桑田,大浪淘沙,真正能够塑造兵学之魂魄的还是兵学中的实践智慧,正所谓“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孙子兵法·计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其三是理性与哲理,它是中国传统兵学的深厚根基。兵法虽然灵动,但绝非没有法度,它必须基于理性原则,对未来可能的利害得失及敌方行动的概率做出冷静的计算,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佳的行动路线。

当然,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非理性因素始终会使很多情况出乎意料,故兵法又必须以辩证逻辑为根基,如此一来,古代朴素的辩证法也成为兵法之魂的固有内容。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传统兵学何以能够如此先进和早熟?何以能达到较高的理性和哲理层次,并以丰富的概念范畴为基础,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兵学思想体系?

笔者认为,这可以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上去寻找答案。倪乐雄曾经谈道:“研究战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既可解释纯军事领域无法解释的现象,使我们对人类军事事务获得新的观察点,进而深入理解人类战争现象,同时又使一向给人以凌空蹈虚的文化研究落实到现实的一个具体领域——战争领域,从而使文化研究亦获得一定的深度。战争与文化互相借助对方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将自身研究引向深入。”<sup>[1]</sup>

事实上,中国传统兵学一直在诸子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成长。比如,儒家对兵家的影响是大家

收稿日期:2022-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重大项目“中国孙子学史”(2019-SKJJ-A-008)

作者简介:姚振文(1966—),男,山东邹平人,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先秦史及孙子兵法研究。

E-mail:bsyzw@163.com

都承认的,儒家的仁本战争观对兵家的暴力运用问题一直起着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兵儒互补或兵儒合流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文化现象,以至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战争伦理观念。再延伸而言,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都是“儒道互补”或“儒表法里”,以此推论,道家 and 法家对兵学又怎能不产生影响!另外,像墨家学派与“非攻”“救守”理念、五行学派与“兵阴阳”思想、纵横学派与“捭阖外交”思想等,也都是诸子思想在战争领域活跃的佐证。总之,中国传统兵学可谓是在与诸子思想的交流渗透、互补融合、相摩相荡中成长和发展,所以,通过“诸子互补”的文化现象,来研究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以及兵学之魂的塑造,当是一个颇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课题。

### 一、先秦诸子思想融合对兵学发展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出现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政治变革,思想文化界也出现了所谓“哲学的突破”。比如,儒家孔子以“仁”的进步观念改造“礼”,道家老子和庄子彻底否定礼乐文明,还有各家相继展开的对“巫”(巫术)的传统的突破(即作为“道”的精神实体代替了巫术所宣扬和信奉的“神”,而“心”的神明变化则代替了“巫”沟通天、人的神秘功能)。这样,人类生活的现实理性、人的突出地位和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仁本、民本观念和德性意识均成长起来。这些思想观念的出现乃是先秦兵学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值得强调的是,基于现实理性的中国传统兵学具有天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而先秦兵家思想的发展乃至成熟也正是在与诸子思想的相互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中完成的。

春秋末期,吸纳了上古兵学和诸子思想精华的《孙子兵法》诞生,并以其“兵者诡道”理论和完善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先秦兵家思想成熟的根基。从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孙子诡道理论的提出实际就是打开了中国传统兵学王国的天窗,或言是找到了中国传统兵学迷宫的钥匙。此后,“兵不厌诈”或“兵以诈立”成为战争指导的根本法则,谋略智慧进入兵学王宫的殿堂。而从另一角度看,孙子对战争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感性认知而表现为形而上的理性认知,并

在古代兵学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兵学思想体系。具体而言,这些兵学范畴包括“知己”“攻守”“虚实”“形势”“奇正”“分合”“迂直”“专分”“因变”“致人”“全破”等等。很显然,它们都是对战争活动中某一事物或因素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也正因为有了它们,孙子才能借以表达出兵学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他的兵学思想体系。

至战国末期,在学术融合的大趋势之下,诸子思想从相互对立到互补融合,从而使得儒家之仁政和民本观念、法家之功利理性意识与道家之自然无为观念等不断融入兵家的思想体系之中,最终进一步推进了先秦兵家思想的成熟。这突出表现在《荀子·议兵》《吴子兵法》《六韬》三部兵书的内容之中。

《荀子·议兵》是以儒家仁政和民本思想推动兵家思想成熟的重要篇章。荀子是一位具有较高军事学术造诣的儒者,他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具有完全不同于孔、孟的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在《荀子·议兵》中,他注意到战争与兵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且更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离不开必要的军事手段。正因如此,他不像孟子那样空谈“仁者无敌”,而是主张“王霸并用”“礼法兼容”,并能在保持儒家思想主体性的基础上,较好地处理了兵家之谋与儒家之仁的关系(即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进而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军事思想体系。从这一点上讲,荀子的军事理论,适应了战国晚期诸子思想由对峙走向融汇的基本趋势,并由此奠定了两汉以后兵儒合流格局的基础。

《吴子兵法》是以法家功利理性思想推动兵家思想成熟的杰出代表。吴起与孙子在中国传统兵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各有千秋。孙子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哲理基础,以兵者诡道理论为核心,以全胜为最高境界,构建了中国传统兵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兵学思想体系,其首建之功自当荣享“兵圣”之盛誉。吴起作为孙子之后继起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单论其在战争观和治军层面的思想主张丝毫不亚于孙子,而其独特的法家改革者身份更造就了《吴子兵法》极为鲜明的功利理性精神。这种功利理性,一方面表现为其兵学理论本身较《孙子兵法》更为深刻的政治

理性意识与效益观念,同时又表现为其对儒家仁德思想的吸收及法家思想与兵家思想的共振共融。这其中深层的原因在于,战国中后期,法家作为主流学派登上历史舞台,使兵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在现实功利层面达到了最深层次的精神契合,同时,战国后期的战争活动具有更暴烈、更血腥、更复杂的特征,它将春秋时代贵族文化和礼仪用兵留下的些许浪漫也扫荡殆尽,从而使《吴子兵法》在功利理性方面大大超越了《孙子兵法》。

《六韬》是综合诸子思想推动兵家思想成熟的杰出代表。这部托名姜太公所著的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既是道兵家的杰出代表,也是综合诸子思想的典范。如果说《孙子兵法》的成熟在于兵学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和哲理化,那么《六韬》的成熟则在于其兼采儒道,融汇诸家,使兵家思想体系更加丰富、更具张力、更趋完善。在战国末期学术兼容的大趋势下,它不仅对兵家的权谋思想有着经典化、体系化的总结,而且在吸收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回答了“为谁而战”的终极提问,确立了“仁诈合一”的用兵原则。同时,它又在继承和改造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升了兵家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确立了刚柔并济的用兵风格。这些内容都是对《孙子兵法》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也是先秦兵家思想进一步成熟的标志。

## 二、秦汉“儒道互补”思想格局对兵学发展的影响

秦汉以降,承续战国时期的学术融合趋势,先后出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三略》等几部综合性典籍,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这一时期的思想界也经历着较为复杂的变化,秦朝以法家思想立国、治国,汉初转为“六家并立”(黄老之学为主),而后经汉武帝“独尊儒术”,形成以儒道互补为主的思想格局。

这里需要做出解释的是,秦汉之际之所以会从“六家并立”(儒、墨、道、法、阴阳、名家)最后变为“儒道互补”,是因为天下统一形势的需要。天下一统就意味着要有统一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理论必须能够以超越性的“哲理”而成为政权的终极依据。这对于当时的六家而言,只有儒家和道家能够做到,儒家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主提

出了宇宙构成论,道家以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为主,提出了宇宙生成论。其他各家,如阴阳家和名家主要是玩概念,太空洞,而墨家和法家又太具体,太偏狭,都难以成为超越性的理论。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秦汉兵学与诸子思想的互动也主要是在“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下进行。

比如,《吕氏春秋》兼采诸家思想,但总体上却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色(吕不韦晚年有民本政治倾向,再加上为统一战争“正名”的需要),这使其关于义兵思想的论述达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和水平。它在总体评价战争起源和性质的基础上,将先秦时期儒家的民本和仁本思想作为评价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的主要依据,并提出了义兵所应该具有的道德责任和基本义务,彰显了古代军事人道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对古代义兵理论而言是一次较为系统、全面的总结。

再如,《淮南子·兵略训》的兵学成就也与其儒、道思想游移的学术立场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淮南子》的道家思想立场使作者能够在《兵略训》中以“道”为本体,理性审视战争的复杂变化,并能从道家之尚无(虚)、主静、贵柔、守弱等基本概念中为战争中的谋略和玄妙战法提供理论依据(兵家注重实用功利,其思想理论性相对单薄,从学术史的角度讲,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当《淮南子·兵略训》作者论兵游移至儒家的思想立场时,他们又能继承孔、孟、荀的民本战争观,注重对战争进行高度的政治化反思,特别突出“政”“兵”相融的特点,最终使得“政治—战争”成为《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命题。也正因如此,《淮南子》的战争观确实“继承了先秦诸子(主要是兵家)进步的军事学说又有所发展和创新”<sup>[2]</sup>。

又如,《三略》也是在这种突出儒家思想的儒道互补格局中推陈出新,提出了自己颇具新意、内涵更加丰富的战争理论。其在中国传统兵学史上最大贡献是构建了从“取天下”向“安天下”过渡时期的新型兵学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了上略、中略、下略三个方面的不同内容。上略是以“统兵御将”为核心的军事战略,它主要从军事层面保证安治天下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胜利;中略是“德威并举”的御将策略,它主要从君将关系层面

努力解决安治天下最敏感的君将矛盾问题;下略是“用贤爱民”的政治方略,它主要从朝廷政治层面保证安治天下的社会基础与和谐秩序。这其中的核心观念就是“政治高于军事、政略高于将略、君主圣明御将、用贤与民本统一”。

另外,还要注意研究这一时期的两个典型人物案例,即汉武帝的“刚武”与光武帝的“柔武”。汉代这两位英主截然不同的战略观念和作战指挥风格,既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他们的性格及所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有密切关系。汉武帝刘彻应该是兵、儒、法有机融合的兵家代表,而光武帝刘秀则是兵、儒、道有机融合的兵家代表,这从相关的史料中可以得到诸多证据。

### 三、魏晋时期玄学及“诸子互补”对兵学发展的影响

魏晋之际,政权交替频繁,战乱动荡不已,故而玄学流行。魏晋玄学本是崇尚老庄的思潮,它以“老庄”理论为基,研究所谓“玄远之学”,实际上是以道家的自然之说反对或改造儒家的名法和礼教。然而,玄学并非与儒学完全对立,有学者曾指出:“鉴于自汉至晋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上都无变化的情况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可能凭空冒出一个与儒学对立并引导当时观念形态的玄学。事实上,被后世认为的‘玄学家’,彼时都自认为在致力于经学,并做出很多成绩。”<sup>[3]</sup>从根本上来讲,玄学的出现是对僵化的儒学(经学)的一次修正,即以自然之生机与活力使某些教条性的儒家理论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另外,玄学还增强了儒学的本体性和思辨性,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以上分析看,玄学是以道家为主综合了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学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影响之下,魏晋之际的兵学发展以诸子互补为根基,同时又偏重于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中有三个典型兵家人物案例值得关注。

其一,是司马懿由儒家道德思想向道兵家思想的转变。司马懿青少年时代虽然受过儒家教育,但同时也接受了道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尤其是司马懿进入曹操的丞相府工作以后,在官场阴暗及政治风险的逼迫之下,其愈来愈受到黄老

哲学的深刻影响。黄老哲学在汉末的动乱和社会灾难中证实了其价值的现实有效性,而司马懿是聪明之人,他不会感受不到这种社会文化趋势的变化,所以,由儒家的伦理道德向道家的自我生存哲学转变,这当是司马懿的理性选择。有学者曾指出:“汉末‘新黄老派’哲学,是后来司马懿灵活运用刑名法术、儒术和一切权术,不忠不信、不仁不义地搞禅代、骗同党、杀降卒、弃发妻而不改色心不跳的思想基础。”<sup>[4]</sup>

在残酷的政治博弈和军事活动中,司马懿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道兵家人物。无论是其冷眼旁观的战略卓见还是其坚毅隐忍的为政作风,无论其权谋万变的用兵策略还是其残酷无情的内争手段,都与道家的自我生存哲学息息相关,并能从道家主要思想观念中寻找到的本源和依据。这虽然是个案,但从中可以看到,道家思想文化对兵家人物的影响是深刻而突出的,对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无形而又深远的。

其二,是谢安对于兵、儒、道互补融合的启迪价值。谢安可谓是中国儒道互补的完美兵家人物,然而就其在兵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更表现为一种偏重道家型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

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人皆希望能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谢安作为士族大家子弟,却寄情山水,不恋功名利禄,其心态之佳、定力之好前所未有。然而,谢安又不那么固执避世,当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他出世的时候,他又义无反顾地“东山再起”,临危受命,承担起支撑天下、挽救苍生的重任。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他大义为上、尽忠尽职,挽狂澜于既倒,保万民于无虞。更为可贵的是,在功成名就之时,他又不恋权势,不贪名利,急流勇退,退出朝廷纷争。此种精神风骨和深远境界几乎可用司马迁对孔子的赞美之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

如果从诸子思想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谢安的精神和人格既非全属儒家,亦非全属道家,既非绝对的内世,也非绝对的出世,它是二者的兼容与互通,又是对二者的统一和超越。换言之,谢安已经成功地克服了传统思想中的儒与道、隐与仕、名教与自然的内在矛盾和对立,而最终实

现了“内圣”与“外王”、“功名”与“无为”的和谐统一,进而达到了一种世人孜孜以求的高端的自由精神境界。而这与魏晋玄学之调和儒道、“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自由人生的文化大转变、大突破是分不开的。

其三是苻坚在淝水之战的失败,也从反面充分说明了诸子互补对兵家成长和成败的深刻影响。任何国家政权都要有核心的文化思想作为立国的基础。就苻坚和他的前秦帝国而言,其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和广泛应用是非常典型的,这也适应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争取了各族上层贵族及普通民众的支持,这是苻坚能够统一黄河流域、建立强势帝国的根本基础。然而,苻坚及属下氏族贵族势力毕竟是刚刚接触汉族文化,对中原地区政权运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没有深入了解,它只懂得儒家道德伦理和政治信仰是政权的理论基石,却没有深入了解道家思想在一个政权运作中也有不可或缺的应用价值。

更何况在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激烈碰撞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还有一个是否正统、孰为正统的问题。在各民族政权割据并立的乱世情况下,苻坚既要通过宣扬民族平等观念以取得各民族人民的支持,又要在意识形态上建立其尊奉同一君主的专制权威,同时还要不断建设实现统一的强大实力。所以,前秦政权的理论支撑必须是兵、儒、道、法互补融合的思想文化体系,而作为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人物苻坚而言,无论是其性格原因还是学识不足原因,他都没有能力构建这一先进的思想文化体系。因此,苻坚的失败是必然的,即使淝水之战不败,他的前秦帝国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因为,当时不同层次的文化还要继续碰撞和融合,历史还要吸纳各方面的新鲜力量和活跃因素,去塑造一个崭新的帝国。

#### 四、隋唐时期佛、儒、道并尊(主要是儒道并尊)对兵学发展的影响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至高峰时期,儒、释、道三家思想在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下也都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统治思想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佛教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比较丰富,儒、道相对比较淡薄。然而,在隋唐的政治教育和典章制度中,儒、道则

是占有更大分量的,更何况在唐代佛学兴盛之时,韩愈等人还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佛、排佛运动,大力鼓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这也进一步提升了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隋唐儒、释、道并尊的思想文化格局对兵家人物和兵书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要么体现为兵家人物在政治军事实践中“进退自如”的完美人生结局,要么体现为综合性兵书对各家思想的并尊与融合(较为平等地认识和对待各家)。

比如,李靖就堪称是中国历史上“进退自如”的完美兵家人物。他一生出将入相,既能在战场上大展身手、尽显才华,又能在政治和官场上站稳立场、收放自如。其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人生境界,一方面是由当时的贤明君主(唐太宗)及个人天赋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儒、释、道并重的思想文化有密切联系。对李靖这种出身宦宦世家的优秀人才而言,接受多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再正常不过,他将诸家思想与其治国用兵实践相融合,应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故而,李靖的一切政治作为和军事实践,处处流露出诸子互补影响的痕迹,当国家和朝廷需要他的时候,他积极入世,报国安天下;当国家和君主需要他让权的时候,他又自如地避世、忍让、不争、不作。正因如此,清代汪宗沂在《卫公兵法辑本·序》中有言:“如卫公者,夙精兵略,参孙子、吴起而大其用,本太公、尉缭而善其术,乃犹韬晦浮沉,不轻一试,直至出入将相,宣威沙漠、成就功名,方著为书史,传颂其临机果、料敌明、根于忠智而止,可谓得实矣。”

再如,李筌之《太白阴经》作为当时的综合性兵学典籍,其兵学思想体系的构建也是平等对待和吸收诸家思想的深刻反映。《太白阴经·主有道德》有云:“唯圣人能返始复本,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在这里,李筌将儒家的“名法”解释为“正”,作为治国的根本;将兵家的“权术”解释为“奇”,作为用兵的关键;将道家的“无事”(即无为而治)作为平天下的总纲领。可见,李筌是从融合诸子的思想立场出发,将儒、道、法、兵各家思想有机地统一

起来,构筑起一个丰富和全面的兵学思想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虽然诸多兵书也有融合诸子的特点,但对各家思想的定位往往不太合理,在地位和作用发挥上不够平衡。《太白阴经》则大大避免了这一缺陷。它对儒家思想没有像秦汉兵书那样大肆渲染和兼采,作者只用少量内容强调了其主导地位;其对道家的思想内容融入也不算太多,作者只是突出了它作为用兵谋略之“体”或“本”的作用;而其作为兵书,关于兵家谋略的阐释和解读自然是主体,但又服从于儒道;法家思想的论述稍弱一些,但也颇能抓住要害。总之,该书对各家思想的论述和定位是比较合理和均衡的,这突出表现了其博采诸家思想而又将其有机地融为一体的鲜明特色。

最后,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表面上看是以道家思想言兵,其本质上也是综合诸子思想。它首先是一部立足于政治层面研究治国与用兵相互关系的政论性著作,其突出成就不在于讨论如何用兵,而是在于探讨如何对待用兵。在作者看来,用兵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权谋手段,而治国才是最根本的目标,书中阐释的“为而不争”思想实际就是要求战争必须服从于最高的政治目的。值得强调的是,王真的这种政治战略思想在本质上乃是道、儒、兵三家思想平等地会通、融合的结果。他巧妙地以道家“不争”思想为出发点,有机融合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及兵家的备战思想,进而形成了政治战略高于军事战略的战争指导理论。而且,这种战争指导理论也很好适应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唐朝后期,唐显宗作为一位杰出帝王,一直立志于实现唐朝的中兴局面,他希望纠正安史之乱以来唐政府对藩镇妥协、姑息的弊政,主张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的声威。然而,唐政府军力财力的不足又使其在实施武力政策的过程中遇到巨大困难,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朝臣反对的阻力。在此种背景下,王真将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结合在一起,既为唐显宗平定藩镇格局的战争行动找到了现实的路径与思路,提高了唐政府对藩镇用兵的信心,同时也阐明了慎战思想的重要性,提醒统治者切勿陷入穷兵黩武的局面。这可谓是一种高明而又切合实际的治国用兵战略理论。故当王真献书于显宗之后,得到其褒奖之语为“本乎道德之旨,

参以理化之源,用究玄微”<sup>[5]350</sup>。

## 五、两宋时期理学兴盛对兵学发展的影响

两宋王朝乃是“得君行道”的理想政治实行最好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宋代理学思想及其他思想也呈现出学派林立的状态。当时的主要学派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以司马光和张载为代表的“朔学”和“关学”、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开启理学传统的“洛学”和“闽学”、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及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另外,还有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崇尚经世致用的功利学派),以及张栻的湖湘之学、吕祖谦的金华学派(与朱熹闽学形成呼应)。这些学派思想发展的主脉当然是由儒学复兴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运动而达成的。然而,这些学派的思想资源又并非仅限于儒家,而是儒、释、道各家交相辉映、彼此融合。比如,无论是王安石、苏轼还是张载、二程、朱熹等,都有明显的出入佛老的痕迹。宋代理学的许多重要概念和范畴有很大一部分也都可以溯及道家文化。

正是在上述理学兴盛、文化繁荣的背景之下,诸子思想在兵学领域的活跃无疑是以兵儒之间的融合与冲突为主脉,同时又有其他思想的渗透和互补,这大概有三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表现为:在文人论兵的过程中,以苏洵、苏轼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对兵儒融合的关注和强调。

苏洵、苏轼对兵学的评论、借鉴和批评是宋代文人论兵中的典型个案,也是宋代兵儒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苏洵苏轼父子二人作为儒家学者,在深入研究兵学的基础上,对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评判观点和主张,其中既有肯定、继承与发展,也有批评与贬抑,而其根本目的则是要以儒家思想渗透和改造兵学,使兵学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服务,为社会政治现实服务(当然,道家思想也会因他们身世的浮沉而时常出现在他们的论兵言论中)。

苏洵苏轼父子论兵的优势在于学术功底深厚,既深通儒学,又对兵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能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主动探讨兵学思想的社会实践价值,这就使得他们有别于那

些顽固排斥兵家与兵学的封建文人,进而在兵儒融合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当然,在宋代“崇文抑武”的时代背景下,二人终究还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言兵,加之他们没有实际的战场经历和作战经验,其对孙子兵学思想的分析和论说也难免有偏颇之言和错误之论,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评判。

第二种路径表现为:在政府军事改革过程中,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对兵儒融合的有力推动。

范仲淹庆历新政改革失败以后,即遭到贬抑,而后又被派往西北前线,指挥对夏战争事宜。范仲淹不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而且也拥有高超的军事智慧,如其对西夏采取的持久作战方略。更主要的是,范仲淹将儒家的士大夫精神自觉融入战争实践之中。他戍边多年,始终以安国全军为根本宗旨,以保护民众生命财产为根本目标,而将个人的生死和利益置之度外。在整个宋夏战争中,范仲淹以其与身共存的士大夫精神,坚持了战争理性,同时也深深表现出儒家“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答赵元昊书》)的天下情怀,最终使得西北边疆居民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宋史·夏国传》载:“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宋史·范仲淹列传》亦言:“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从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角度讲,范仲淹所为既体现了儒家怀柔远仁、四海一家的儒家战争观念,也体现了兵家不战屈人的全胜理想境界。这当是中国传统兵学史上兵儒融合的最佳范例,也是战争领域“仁”“诈”辩证统一的典型个案。而从长远来看,它则是儒家人文精神与兵家谋略智慧的一次史诗般的碰撞与交融。

第三种路径表现为:在战场实践中,是以岳飞为代表的武将群体践行兵儒融合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岳飞乃志向远大之人。他出身农家,刻苦自学,在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之后,立下忠君报国的远大志向,并且义无反顾、不惜性命地践行自己的理想目标。然而,岳飞生活的时代是君主专制时代,他面对的敌人不仅有金国的朝廷和军人,也有南宋政权中的昏君和奸臣,他认识不到

君主政治的残酷与无情,更缺乏必要的屈伸策略保护自己,而是始终以一腔热血和美好愿望参与封建政治,这无疑注定了他最后的人生悲剧结局。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讲,这是儒、道、法三家思想在兵家身上既融合又矛盾、冲突的体现。岳飞抗金之所以能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与其自身接受的儒家思想理念有密切关系。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伦理渗透于战争领域会成为一种莫大的精神力量,它既赋予了岳飞执着追求“收复中原”目标的坚定意志,也塑造了岳家军拼死作战、英勇牺牲的无畏士气和战斗力。然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岳飞的出身、性格、学识和政治素质缺陷,决定了他能够实现兵与儒的结合,却难以协调、处理儒家政治理想和君主自我功利的内在矛盾,更难以达到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高层境界。具体而言,他具备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却又不幸伴生着一个刚猛率直的偏执性格;他置身于南宋上层政治、军事集团,却又不谙于官场内部的圆滑和世故;他尽心竭力服务于南宋朝廷,却又不不得不触犯皇帝的个人权威,这是岳飞人生悲剧的历史文化根源,也是中国古代兵家兵儒融合的历史局限。

## 六、明清时期心学和理学鼎盛对兵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思想界经历了理学衰落、心学兴起,而后理学又复兴的曲折发展过程。

在明代,君主专制的政治生态已经恶化到极致,最终逼迫阳明心学转而选择自下而上的“觉民行道”的思想路线,此种哲学思想的重大变化渗透至军事领域即表现为对战争主体(将帅和士兵)主动性作用的高度重视,而其相关的致良知及知行合一理论也必然推动具体的用兵、治军理论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士兵因理念和信仰教育而自觉于战场上勇猛作战,这是本质上的转变),进而真正实现了儒家价值理性与兵家功利理性的有机结合,这当是明清兵家对传统兵学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王阳明用兵智谋高超,善用诈术,多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明史》评价他说:“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

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sup>[6]2836</sup>历史上,孙子曾以3万军队击败20万楚军的辉煌战绩而被后人赞誉。事实上,王阳明也创造过这样的奇功,他仅靠临时拼凑起来的3万军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击败了准备了十年、拥有18万兵力的宸濠叛乱,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王阳明用兵艺术达到这样的高度,自然当归功于其高超的兵学素养和智慧。其兵学智慧与他的心学思想是相为表里的,有学者曾指出,在他身上体现出“融心学于兵学之中的军事哲学思想”<sup>[7]5</sup>。他自己也讲:“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sup>[8]72</sup>可见,心学当是他用兵成功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兵学与心学实践结合的基础上,王阳明对于兵儒融合的许多深层机理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这意味着他在兵儒融合的理论层面也实现了较大突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比较而言,戚继光是更侧重于在实践领域推动心学与兵学结合的人,在这一方面,他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戚继光在《练兵实纪·练将》中讲道:“心术正,则志向自立而不忒;志向立,则死生自明而不畏;死生明,而利害自辨;利害辨,人品自好;做好人,而未有不知坚操守者也。”从这一内容看,戚继光将阳明心学的功夫论具体演化为治军实践中的将帅素养理论,从而创造性地将“练将”与“练心”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兵学与儒学的有机贯通与内在统一。如此一来,戚继光为后世实实在在地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兵学命题,即政治理念及相应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治军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将帅的道德素质与政治信仰在战争实践中往往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

到清朝时期,心学遭受打击,理学受到推崇,曾国藩、胡林翼等以儒家理念建军、治军,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成功融合诸子的兵家群体,其代表性著作即为《曾胡治兵语录》。

曾国藩是兵、儒、道、法各家思想融合的典型代表人物。他能够在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以忠义血性的儒家理念创建湘军,维护清朝政府,可谓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与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体悟和自觉运用有着密切的

关系。从他的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应用的精髓及社会实践价值,他可以算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一尊偶像。同时,还应认识到,一个人既有至高的精神追求,又有现实的功利理性,还有中通世界的成熟与灵活,如此圆融、和谐的心灵智慧和学术素养,无疑是成就其人生事业及军事功业的深厚动力,而这又是由兵、儒、道、法各家思想彼此渗透、融合互补的结果。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曾言他是“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sup>[9]</sup>如果说儒家思想给他的是一种政治理想和道德理念,法家给他的是冷静的现实功利意识,而道家给他的则是守柔、退守、自保的自我生存哲学。从曾国藩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诸子思想融合对兵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也看到了二者之间互补的卓越功效及长远前景。

## 七、结论

诸子互补推动传统兵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兵学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先秦时期无疑是奠基阶段,孙子的兵学思想体系及其与儒、道、法各家思想的渗透与融合,最终推动了先秦兵家思想的成熟和完善。至两汉时期,在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影响下,秦汉三部综合性典籍的兵学思想内容,基本完成了以义战为核心的中国特色伦理战争观的定型,同时也形成了兵儒合流的基本架构。魏晋至隋唐时期,兵学思想的发展在接受各家思想融合的基础上,更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司马懿、谢安、李靖等兵家人物以及李筌的《太白阴经》和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等兵家典籍,都是典型代表。到两宋时期,理学的兴盛使儒家思想的哲理性得以恢复和提升,由此也推动了兵家思想进一步向儒家的道德化殿堂迈进,最终使“思诚之道”与“明诚之道”成为兵儒融合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到明清时期,由于王阳明、戚继光、曾国藩等著名儒将的出现(他们本身亦有出入佛老的思想经历),故能以心学或理学功底推动兵家之功利理性与价值理性(仁与诈、义与利)的完美结合,从而使兵家思想在价值观和道德意识层面达到了顶峰。

从未来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传统兵学在诸子思想互补融合的大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使它较之于世界其他兵学而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显著的人文特色,这是它迄今仍然领先于世界军事文化发展,并能在各行业、各领域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根本原因所在。

#### 参考文献:

- [1]倪乐雄.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许匡一.《淮南子》的军事思想[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5(1):95-102.  
 [3]严耀中.关于魏晋玄学属性的再辨析[J].中华文史论丛,2017(4):211-230.  
 [4]王晓毅.司马懿与曹魏政治[J].文史哲,1998(6):87-95.  
 [5]河上公,杜光庭,等.道德经集释:上[M].北京:中国书店,2015.  
 [6]张廷玉.明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6.  
 [7]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8]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  
 [9]宫玉振.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N].北京日报,2015-05-25(23).

## “Complementation of Ancient Schola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Science

YAO Zhen-wen

(Sun Tzu Research Institute,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science has been grow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ancient scholars. During various major historical periods in China, all the thoughts of ancient scholars have had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cience. Taking typical military figures and military classics as a case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ought can be found under this influence. It needs to be emphasized that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why Chinese military science can reach a very high philosophical level and spiritual realm and can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s ancient military culture remotely is that it fully absorbs and draws on the essence of the thoughts in its resonance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thoughts of various ancient scholars.

**Keywords:** complementation of ancient scholars; military science; military figures; military classics; 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许 金)